

品味人生文丛

44.617051

JWR

《胡适：人生坦言》

举自由主义旗帜，主张坚决反传统，再造新文明，但开风气不为师；以整理国故为手段，标榜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终究充任过河卒。他的人生体验别有滋味，温文尔雅的文字里透出几分无奈。

人生坦言

胡
适：

闻纪宁 胡晓选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人生是个道之不尽的话题，也是历代文化人颇为关注的难题。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一批批叱咤风云的思想家、学者不仅关注“救世”的现实问题，而且瞩目“做人”的永恒课题，他们或苦吟，或沉思，或倡导，愿苦难的中国人在乱世之中能图生存，求温饱，以免愧对养育自己的一方热土。有的还追求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们对人生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或有前后不一的矛盾，这样那样的偏颇，言行相殊的缺陷，但是作为一代文化名人，他们确实各有自己关于人生的独特见解。我们这里选编他们的一些言论，既不意味着赞同他们的全部观点，也不是要提倡他们中一些人不妥甚至错误的做法，而是想为处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青年提供某种启示，引发读者对人生问题形成自己新的体味和见解，从而使自己生活得更为充实，更有价值，对社会和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选编这类言论，并非易事，不仅要有史家的学

养,而且要有选家的眼光和现代人的意识。这套《文丛》无论选择言论还是介绍、注释,可能都有种种不足甚至不妥,我们盼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

编 者

导 言

20 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诸子林立，群星璀璨，胡适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毛泽东曾经说过：“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见《西行漫记》）可见胡适在五四时期的名望之高，影响之大。50 年代，美国一家著名杂志《展望》推举当代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100 个伟人，胡适名列其中。胡适一生得过 1 个博士学位，35 个荣誉博士学位，可谓中国学人之冠，足见胡适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

胡适（1891. 12. 17——1962. 2. 24），乳名嗣糜，行名洪驊，后改名适，字适之，曾用笔名、别号糜儿、小珊子、麻禾生、期自胜生、铁儿、毅斋主人、

适广、胡天、冬心、蝶儿、适庵、希疆、藏晖、姜素、天风、胡舒、著作监、绩溪牛、大书箱、侯博士等 30 多个。祖籍安徽绩溪，出生于上海。父亲胡传，原名珊，字铁花、守三，秀才，理学家，受业于上海龙门书院刘熙载门下，先后在东北、广东、河南、江苏、台湾等处充任幕僚或地方官佐，最后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不幸因病英年早逝，是年胡适才 4 岁。母亲冯顺弟，胡传续弦，出身贫寒人家，胡传死时她才 22 岁，身兼慈母和严父双重责任，同时挑起了胡氏大家庭的重担，她的忍辱负重精神和苦口婆心训诫，对胡适一生影响很大，胡适在《先母行述》中作过感人至深的描述。胡适 4 岁入塾，因当时已认识 1000 多字，无需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等启蒙课本。在 9 年的家乡教育中，胡适除阅读父亲生前为他准备的教材《学为人诗》、《律诗六钞》、《原学》等外，还学习了“四书五经”等传统教材，同时在课外阅读了《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白话小说，为后来的白话文革命埋下了伏笔。1904 年春到上海求学，先进梅溪学堂，后入澄衷学堂，开始接触西方科学文化。像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崇拜严复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新民说》，也涉猎过《民报》、《革命军》等革命派的代表作品。1906 年夏，考取中国公学，不久加入竞业学会，担任过《竞业旬报》的主笔和主

编。1910年,考取留美官费生,这是胡适人生路上一大转折点。初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不久转文学院,专攻哲学和文学。1915年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主攻实用主义哲学,从此把杜威学说当作一生生活和思想的向导。留美期间,他对西方哲学、文学、历史、教育、政治、文化等作了较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对美国的社会状况、民情风俗有了许多的感性认识,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洗礼;同时在《新青年》上发表一些有影响的文章,首倡文学革命。1917年7月应蔡元培和陈独秀邀请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直接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员年轻有为的猛将。后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开始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分道扬镳。1919年,出版根据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增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20年,出版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本白话新诗集《尝试集》。1922年,创办政论性杂志《努力周报》,提倡“好政府主义”,号召“整理国故”,参加“科学与人生观”论战。1926年至1927年,游历英、法、苏、美、日等国。1928年至192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新月》杂志,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挑起“人权与党治”论战。1931年10月,在南京首次谒见蒋介石。1932年,创办《独立评论》,继续发挥“超然独立”的“监督政党的政论

家”的作用。1933年，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久因政见分歧退出。抗战爆发，接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奔走演说于欧美各国，争取国际舆论和西方财力物力对中国的支持。1946年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出席国民党“制宪国大”。1947年，提出发展教育学术的10年计划。1949年，与雷震商议创办《自由中国》，客居美国。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8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拟《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并担任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1962年2月，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因心脏病猝发逝世。胡适在现代学术文化转型重建时期，运用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方法，在诸多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思想界成为一位极富个性、颇受争议的著名人物。

二

在学派林立的现代西方哲学中，实用主义算得上是产生较早、流传较广和影响较大的重要流派。它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世界时代潮流与美国民族精神交汇融合的思想结晶。它迎合了进步的时势需要，反映了美国人求实尚新的精神风貌，因此能深深地渗入美国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尤其是渗入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博得了美国朝野上下的交口称赞和极大赏识,成为美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先锋意识和主导精神。由皮尔士、詹姆斯开先河、杜威集大成的实用主义,在美国思想界统治了几十年,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也很大。本世纪40年代后,其领导地位逐渐被逻辑实证主义取代,但其后期的代表人物刘易斯、胡克、蒯因仍建树颇多。60年代后,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强劲的学派已不复存在,但仍通过与其他后继的新兴哲学流派的融合,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实用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具有以下一些思想特征:(1)它从人、人的境遇、人的活动和事业出发,研究和解决与人有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实用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哲学。它反对抽象玄虚的思辨形而上学,强调思想、认识 and 理论必须服务和指导人的具体生活和实践,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和人对自身命运的决定性。因此,英国代表人物席勒称自己信仰的“实用主义”为“人本主义”。(2)它认为人的本质就是活动,人以自己的事业和达到自己目的的行动为中心,以效果、实绩、有用性作为检验人的思想和行为有无意义的根本标准,也成为证明自己存在和价值的重要依据。(3)它主张世界是偶然的,因此一切都是可能的、暂时的、相对的,反对一成不变的决定论,否定毫无例外的唯一

必然性，拒绝绝对主义、权威主义和一元论，主张多元论。(4)强调人的生活本性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的实质是人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进行自由的实验，而实验又是具体的，因而人的认识和真理都是具体和相对的，是以各人对某项事业的实验为转移的。实用主义这些思想特征，确实深刻地反映了美国人那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主张自由民主、反空谈尚实干、追求成功和福利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说，从文化品格上看，不是凝重沉思的德国人，不是温情浪漫的法国人，也不是保守拘谨的英国人，而是生龙活虎的美国人创立了实用主义哲学。

胡适留学时期的美国，正是实用主义独领风骚的黄金时代，他拜杜威为师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青年胡适无意从本体论的角度架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不愿意移植脱离改造现实社会的纯哲学，试图以启蒙救国为目的，在中西思想中找到最佳契合点。因此，他选择了拒斥形而上学、强调实证行动效用的实用主义，并且特别偏爱杜威的思想学说。他认为谈本体很容易滑向玄而又玄的空疏、不了了之的思辨和不可思议的超验，对解决现实问题无助甚至有害。他信仰的实用主义是建立在相对真理论、历史进化论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新经验主义，也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独立、

人权、法治、博爱、宽容、互助、互利等近代启蒙精神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胡适没有采纳比杜威实用主义更加缜密科学化的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主义,没有接受博大精深的康德、黑格尔,是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哲学家的问题,不是普通人的问题。胡适对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杜里舒的生机主义不感兴趣,是因为他们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拒斥,是因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合实用主义者的脾胃。胡适的思想基础可以简要概括为:哲学是入学、实学、社会学,是科学的侍女;人是理性的、智慧的、文明的,是环境的主人;社会是有序的、渐进的、不朽的,既是现实人生的战场,又是未来人类的乐园。

三

自由主义相对于专制主义而言,肇始于19世纪初的欧洲,反映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要求,主张国家应该保障人身和私有制的安全,维护以公民自由为基础的社会。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孔德,英国的边沁、穆勒。欧洲近代自由主义在崇尚独立自主精神的美国影响很大,突出反映在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独立宣言》不仅是美国人宣告脱离大英联邦、实行民族独立的集体声明,而且

更是美国人承认以个人为核心的近代人权观念的呼声。宣言开宗明义便说：“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他们都享有天赋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人类为保障这些权利才组织政府；政府的适当力量须经受治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假如任何一种政体有害于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改革或废除它的权利，这些真理我们认为是不证自明的。”

胡适留学期间，饱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对自由主义精神一见倾心，归国后即在新文化运动中大力倡导“易卜生主义”。胡适以独立的个人自由意志为出发点，强调“贵生重己”，他很欣赏易卜生的纯粹个人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直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的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胡适认为“求出自己”就是中国传统的“穷则独善其身”，就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因此“个人须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性，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个人是高尚的，社会是沉沦的，因此孤独悲壮的个人要“救出自己”，更要“拯救社会”。要“担干系，负责任”，做“健全的个人主义”，不做自私的个人主人，不做独善的个人主义。不隐

退，不出世，不幻想“乐土”，不蜗居“新村”，直面人生，冒险进取。“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乌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胡适中晚年直接举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他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的内涵是：“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他特别指出，思想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游行自由等政治权力，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与的，而是一些先进民族通过长期的奋斗争得的。这里他已经超越了“天赋人权论”，注意到人类用流血牺牲争得的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力，但他没有引申出使用暴力争取权益的革命理论，仍然把自由主义纳入和平主义的圈子。他认为，自由民主思想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先秦思想中已经闪烁出不少自由民主思想的火花，但由于中国 2000 多年的皇权统治，自由民主思想难以在上层社会流行并且制度化，无法和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媲美。民主政治制度是西方自由主义运动的贡献：“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民主政治的要义是国家统治权掌握在多数人民手中，但西方自由主义在 200 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

特殊的重要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力，养成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和风气。胡适特别欣赏他的历史老师白尔先生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因为容忍是自由的根源，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现代自由主义还包含和平改革的意思，即和平转移政权，用民主法制手段改革社会。而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改革的唯一基础。反对党的设立，一为政府设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二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转移政权。胡适认为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最根本区别是：（1）急进和过激的革命方式，不同于进步的逐渐改革的方式。（2）控制划一的原则，不同于互异的个人发展的原则。胡适曾经认真研究过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但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试图把社会主义纳入英美民主政治的体系：“社会主义的运动只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只是民主运动的一个当然而且必然的趋势。在这六七十年之中，社会化的经济立法逐渐增多，

劳工党也往往可以用和平方法执掌重要国家的政权,积极推行社会化的经济政策。”由此可见,胡适倡导的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和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相通的,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相异的。胡适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也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德意,主张中国社会引进和嫁接英美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

四

世界主义针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而言,是19世纪流行于欧美的一股政治思潮,主张“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人类是一个整体,世界也应该是一个理性主宰的整体;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世界主义的联盟最终必然会形成。应该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属性的世界主义联盟和无产阶级属性的国际主义阵营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

胡适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世界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世界主义思想是在留美期间逐渐形成的,学习生活的环境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他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时,接触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参加了多次世界学生会的活动,并与许多外国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参加世

界和平主义运动中，接触到了不少名震欧美的世界主义领袖人物，如安吉尔、纳司密斯、墨茨、洛克纳、麦克东纳等，他抱着仰慕的心情和这些“和平主义巨子”们交往，思想上受感染是理所当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世界主义理想也使他深受鼓舞，他由支持罗斯福迅速转向支持威尔逊，威尔逊的信誓旦旦及美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能不使年轻的胡适对“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世界主义更加充满信心。

胡适虽然以世界主义著称，但早期的民族主义情绪是相当浓郁的。他在上海读书时写过不少爱国诗文，在《竞业旬报》上发表过不少洋溢着朴素爱国主义的文章。留学美国后，他仍然为祖国的命运担忧：“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吃，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武昌起义一周年纪念日他格外感慨：“天雨朦胧，秋风萧瑟，客子眷顾，永怀故国，百感都集。”应该说，他当时的爱国主义还停留在感情层面上，缺乏理性支柱。随着他卷入美国学界的世界主义运动，他的爱国观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更趋同英国思想家卡莱尔的爱国观：“我们希望的爱国主义是不带成见的。我们的国家爱护我们，不损害我们的人生观，热爱和尊重兄弟国度。我们自然更加尊重和热爱我们庄严的祖国，珍视她经过长期奋斗，用智慧创造的崇高的社会形态和精神

生命。”他指责但论国界不问是非的狭隘国家主义，也不赞成但知天下不知国家的古典世界主义，“吾之世界观念之界说曰：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从这一立场出发，在国际政治中，他反对种族主义和强权主义，“参加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种族歧视、贪欲、非正义的侵略的任何运动都是我们的责任，它们不正是我们的死敌吗”？

胡适深受老墨佛耶“不争”、“非攻”思想浸染，积极投身于世界和平主义运动，不主张“以暴易暴”，提倡以人道易兽道，以公理制强权。但人道何在？公理何在？胡适的回答是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不欲施诸吾同国同种之人者，亦勿施诸异国异种之人也。此孔子所谓‘恕’也，耶氏所谓‘金律’也，康德所谓‘无条件之命令’也，斯宾塞所谓‘公道之律’也，弥尔所谓‘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为界’也。”以人道、恕道、公道、柔道，抗拒兽行、强权、私欲、暴力，自然是以一种以柔克刚的智慧哲学作后盾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不争主义促使胡适在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之际，写下了那封“忠言逆耳”的《致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胡适认定不争主义是根本解决世界纷争的“灵丹妙药”：“我们必须选择不争的态度，这不是权宜的态度，而是正

确的态度，不是由于需要，而是在于我们自己抉择。我相信拯救世界的良方，必须从这个久被遗忘的真理中寻找。”当他接触新和平主义领袖安吉尔及研读其名著《大幻觉》和杜威的论文《力量、暴行和法律》、《力量与强迫》后，对信奉的不争主义有所修正。《大幻觉》的主旨是：两种力量如果发生冲突，最后必然是相互抵消而形成浪费。强权主义发动战争的结果只能损人又损己，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杜威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把战争作为力量应用是一种误解，战争是一种暴行，不是力量，因而是无道德的和无效的。而真正的力量可以影响世界万物，正义的和平运动只有以政治实力作后盾，用法律和集体的力量制裁和战胜强权主义。胡适对不争主义的修正集中体现在1916年发表的获奖征文：《在国际关系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暴力？》。他特别指出，“此文受安吉尔与杜威两先生的影响最大”。胡适开始由偏向道义的力量转向偏向法律的力量，由侧重内在的个体的精神抗争转向侧重外在的团结的实力制裁。

归国后，他始终站在世界主义立场上，抨击狭隘民族主义，一些偏激言辞让不少人感到他有民族自卑和虚无情绪。事实上他是一个乐观主义和理性主义者，他对病态民族的反省和忏悔基于一种博大深沉的民族复兴精神，类似于“卧薪尝胆”、